

CERAM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故宫陶瓷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ERAM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陶瓷图典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宫陶瓷图典 /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047-997-7

I. ①故… II. ①故… III. ①古代陶瓷—中国—图录

IV. ①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8096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 季 李文儒

委 员 纪天斌 王亚民 陈丽华

冯乃恩 余 辉 胡 锤 张 荣 胡建中 闫宏斌 宋纪蓉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付红展 赵 杨 马海轩 娄 玮

故宫经典

故宫陶瓷图典

主 编: 吕成龙

摄 影: 李凡 赵山 刘志岗

责任编辑: 冯印凉

编辑助理: 周利楠

装帧设计: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王梓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www.culturefc.cn gugongwenhua@yahoo.cn

制版印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2

印 张: 27

字 数: 95 千字

图 版: 282 幅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047-997-7

定 价: 290.00 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鼎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和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

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故宫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紫禁城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涵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5/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概况 吕成龙

010/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精品

011/ 新石器时代

020/ 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汉

027/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037/ 隋 唐 五代

053/ 辽 宋 西夏 金

089/ 元

108/ 明

211/ 清

312/ 图版索引

318/ 后 记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概况

吕成龙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创立的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其文物收藏是建立在原清宫旧藏基础上的。由于日本侵华、故宫文物被迫避敌迁移，及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部分文物迁台，致使原清宫旧藏文物分藏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原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库房。原清宫旧藏文物存放在台北故宫的有近 60 万件，存放在南京的有 10 万多件。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150 万件文物，其中约 85% 系原清宫旧藏。150 万件文物中陶瓷器约占 35 万件，而且陶瓷藏品中的绝大多数为原清宫旧藏的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御用瓷器（俗称“官窑”）。1949 年以后，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拨交、私人捐献以及流散文物征集等渠道，原清宫旧藏陶瓷得以充实、补缺。故宫博物院所藏中国古陶瓷的最大特点是流传有绪、品种齐全、数量庞大、质量精湛、真实可靠，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博物馆或美术馆所藏中国古陶瓷不能比拟的。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数千件基本完整的古陶瓷实物资料和从全国各地 150 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古陶瓷窑址采集回的 3 万多片古陶瓷残片标本。

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宫廷使用和收藏陶瓷器至迟可上溯至六朝时期。1997 年 6 月至 9 月，考古工作人员在湖南省湘阴县城沿江马路清理了一座在地层叠压关系上属于隋代龙窑打破南朝龙窑的窑头部分，在隋代龙窑上积

压有零星的初唐时期窑业堆积，堆积物中出土了一件做工精致、底部刻划“官”字款的匣钵，同时在隋代龙窑下面的南朝堆积层中，发现内底印有“太官”字样的青瓷碗^[1]。另外，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隋末至初唐湘阴窑青瓷碗，碗内底中心印有“大官”二字。“太官”亦作“大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宴享之事。北魏时太官掌百官之饌，署光禄卿。北齐、隋、唐因之。宋代以后，皇帝膳食归尚食局管理，太官只掌祭物。由此可见，湘阴窑在南朝至唐代曾经烧造过专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

唐、五代时期，朝廷曾诏令一些产品质量优良的窑场烧造贡瓷，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唐·李肇撰《国史补》、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有河南、浙江向都城长安进贡白瓷和青瓷的记载。如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的《大唐六典》即记载了邢州瓷器入贡情况，其卷三曰：“河北道贡……恒州春罗孔雀等罗、定州两窠细绫，怀州牛胶、洺、博、魏等州平绫、邢州瓷器。”唐代河北内邱邢窑曾烧造过署“盈”字、“翰林”款的精细白瓷，这类白瓷在唐代长安大明宫遗址、西明寺遗址等皇家宫殿寺庙遗址及唐墓中均有出土，应是唐代宫廷内皇帝私库“百宝大盈库”和负责承旨制诏的“翰林院”专用器的标志。《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邑役伪滥，及逃户许

归首，免五年征赋……时又杨崇礼为太府卿，清严善勾剥，分寸锱铢，躬亲不厌……又王进计，奋身自为户口邑役使，征剥财富，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使人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新唐书·食货志》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是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存其多少。”当时的大盈库是皇宫内最大、储存财物最多的宝库，库内财物只能由皇帝一人所支配使用。

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奉之职，并非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待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其职始重。玄宗又特置学士院，并兼翰林之职，遂称为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造，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翰林学士的朝参及官服等班序，都与诸官员中知制造者相同。翰林院的具体位置是在大明宫右银台门以北的西城内，1984年7月和199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对翰林院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其建制与规模基本搞清。

五代至北宋早期，吴越国钱氏统治者为了保全一隅江山，曾向中原朝廷大量进贡越窑青瓷或秘色瓷。《宋史》、《宋会要》、《十国春秋》等均有记载。如《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倣贡……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乾德四年……惟治又献……扣金瓷器万事……”《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文穆王世家）载：“清泰二年，王贡唐……金陵秘色瓷器二百事。”《宋会要》载：“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濬进……金陵秘色瓷器百五十事。”

宋代朝廷先是诏令几个烧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后又专门设立汝窑、钧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等官办瓷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官窑瓷器一旦烧成，就经严格挑选直入宫廷，一般不得作为商品出售，落选者也要砸碎后集中深埋，不得流入民间。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引南宋·叶寘撰《坦斋笔衡》“窑器”条云：“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2]个别官窑瓷器只有在“供御拣退后方许出卖”。如南宋·周辉撰《清波杂志》卷五云：“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又汝窑官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3]

北宋时期个别皇帝对古器皿也嗜好成癖，其中以徽宗皇帝尤甚。当时，士大夫之家凡有古器皿都要悉数献出，不得隐藏。好事之徒为巴结有权势的人，不惜重金搜求，一器有值千缗者。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卷下）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坟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4]以帝王的名义搜集古器皿自然容易，而且所得皆为精品，“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金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坟墓，破伐殆尽矣。”且“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机构）所贮至六千余数百

器……及宣和后，则咸蒙著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并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传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5]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包括汝窑、定窑、耀州窑等为北宋朝廷烧造的贡瓷），在北宋灭亡以后，悉被金人劫掠辇运至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后又转运至中都（今北京），另有少部分随宋室南迁至临安。南宋时，临安朝廷崇尚侈靡，宫中对各类艺术品的聚藏愈渐增盛，其中即包括大量各地名窑瓷器。

元代蒙古人统一全国后，南宋宫廷收藏的宝物（其中包括大量官窑瓷器）被转运至大都（今北京），并集金中都之收藏为一体，成为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之基础。

明代初期，宫廷已收藏数量可观的宋代名窑瓷器。《宣德鼎彝谱》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拣选……”^[6]明、清两代朝廷均在景德镇设御器（窑）厂，并选派督陶官驻厂监造，集中全国的优秀工匠，使用优质原料，不惜工本，大量烧造宫廷用瓷，从《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省大志·陶书》、《瓷务事宜示谕稿·序》、《陶成纪事》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看，其烧造数量十分惊人。如宣德八年（1433年），应专掌御膳的机构“尚膳监”之要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7]。成化年间（1465～1487年）虽无确切的数字可查，但“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貲”^[8]。正德年间（1506～1521年），朝廷曾两度委派宦官至景德镇监督烧造10余万件瓷器。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时期，朝廷更是接连不断地下达烧造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共烧造瓷器62万余件^[9]，隆庆朝烧造12

万余件，万历五年至二十二年共烧造51万余件^[10]。

清代御窑厂的烧造数量更大，康熙十九年（1680年）至二十五年共烧造瓷器“十五万二千余件”。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初九日，内务府总管、负责管理淮安关务的年希尧在奏折中称：“臣自本年正月初七日由臣淮安关署启行前往江西，业已具折奏明。臣抵景德镇之后，随将窑务事宜斟酌料理。窃惟此番烧造磁器，原议照依康熙十九年之例动用钱粮，是彼时事属尽善，今宜踵循而行，若稍有未协，亦必更改妥贴，以期无负皇上任使之万一。臣查十九年烧造磁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磁器共得十五万二千余件，动用江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若以现今之物料工价时值计之，甚属相悬。臣因检查江西藩司衙门送到印信档案，方知彼时烧造磁器所用物料俱派自饶属七县公捐，匠工食用则出自各窑户帮贴（此处雍正皇帝朱批：想当然耳），烧窑需用柴薪，又系窑头办公，甚至差员日用米疏，亦系闾省之司、道等官按月轮流供给。是名虽开销钱粮，是未于磁器之上动用分毫也……”^[11]乾隆四年（1739年）唐英作《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曰：“余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两，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12]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和硕庄亲王、总管内务府大臣传阿三、德英、四塔缮写折片具奏，“查得瓷器库现今收贮康熙年款圆器二十六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件、琢器七千四百三十五件，共圆、琢器二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件。雍正年款圆器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三件、琢器八千三百八十二件，共圆、琢器十六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件。乾隆年款圆器十五万八千四百八十二件、琢器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二件，共圆、琢器十七万二千八百十四件。以上三项共圆、琢器六十一万一千三十九件。”^[13]“乾隆二年至十一年，此十年内呈进过各色圆、琢器十一万六千三百九十九

件，次色变价圆、琢器十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五件，共用银九万五千四百六十两一钱五分一厘。除变价银九千一百二十五两一钱一分九厘，实用银八万六千三百三十五两三分二厘。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此十五年内呈进过各色圆、琢器十三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件，次色变价圆、琢器十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五件，共用银十万五千三十八两五钱二分四厘。除变价银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九钱一分二厘，实用银八万六千七百三十九两六钱一分二厘。”^{〔14〕}也就是说，乾隆二年至二十六年的二十五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共呈进过各色圆、琢器二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三件，次色变价圆、琢器三十一万三百九十件，共用银二十万四千九十八两六钱七分五厘，去除变价银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三分一厘，实用银十七万三千七十四两六钱四分四厘。平均每年呈进各色圆、琢器 9860 多件，次色变价圆、琢器 12410 多件，用银 8000 多两，除去变价银后实用银 6900 多两。依此推算，乾隆二年至六十年的 59 年间，约进呈过各色圆、琢器 58 万多件，次色变价圆、琢器 73 万多件，共用银 47 万多两，除掉变价银 6 万多两，实用银 40 多万两。

乾隆以后各朝均沿袭这种御窑进呈制度，除了个别年份如同治元年（1862 年）至三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殃及景德镇，致使御窑厂一度停烧外，其余年份均未停止。其中进呈数量最大、耗资最多的当属光绪朝的 34 年间，这与光绪朝喜事多以及慈禧太后的挥霍无度有密切关系。根据档案统计，光绪朝 34 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共进呈过上色圆、琢器 24 万多件、次色圆、琢器 57 万多件。破损圆、琢器 17 万多件。实用银约 130 多万两。

明、清时期的御用瓷器进入宫廷以后，虽有不少因日常使用或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被损耗、散佚，但仍有相当多一部分被妥善保存下来。

经过明、清 26 代帝王在 540 多年间的积累，至清代灭亡时，皇宫内保存的陶瓷器达数 10 万件之巨。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这些瓷器中的绝大多数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及私人手中也有零星收藏。仅故宫博物院即收藏原清宫旧藏瓷器约 32 万件，其中包括大量闻名于世的珍品和孤品。如：唐代邢窑白釉花口碗，造型优美，釉色洁白如雪；宋代汝窑天青釉樽，釉呈淡天青色，釉面开有细碎冰裂纹，给人以恬淡雅致之美感；宋代哥窑鱼耳炉，造型古朴，“金丝铁线”交织如网分割釉面，妙趣自然天成；宋代官窑弦纹大瓶，釉色粉青，釉层肥腴，充分体现出官窑青瓷美若古玉的特点；宋代钧窑出戟尊，釉色月白，古朴典雅；宋代龙泉窑青釉凤耳瓶，釉色青翠，美若翠竹；宋代定窑孩儿枕，釉呈象牙白色，以胖娃的背部作枕面，憨态可掬；元代蓝釉白龙纹盘，以天然蓝宝石般的釉色衬托白龙，异常醒目；明代永乐青花压手杯，砂足滑底，造型稳重，是目前仅见的署永乐年款的永乐官窑青花瓷器，弥足珍贵；明代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盖罐，造型奇特，青花发色艳丽，是皇家设置坛场的法物；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造型娟秀，胎薄体轻，色彩淡雅，备受后人赞赏；明代弘治黄釉描金双兽耳罐，釉色娇嫩，金彩熠熠，是皇家祭祀用器；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色彩绚烂，华丽至极；清代康熙紫红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色彩逼真，传世仅此一件；清代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胎体薄如蝉翼，绘画精细入微，可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乾隆各色釉彩大瓶，形体高大，集各种釉、彩于一体，博得“瓷母”之美誉。

1949 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新入藏的陶瓷器中亦不乏精品，其中有些原本就是清宫旧藏品。例如，国家曾将末

代皇帝溥仪出宫以前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部分瓷器，复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孙瀛洲先生（1893 ~ 1966 年）在从 1956 年至 1966 年的 10 年间里，先后将个人收藏的 3000 多件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陶瓷器占 2000 多件，其中有 25 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万里先生（1892 ~ 1969 年）是中国近代一位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1949 年奉调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任研究员。从 1954 年到 1959 年共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 139 件（套）文物，其中陶瓷器 136 件（套）。

韩槐准先生（1892 ~ 1970 年）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是一位从割胶工人出身而成为考古学家的传奇人物。1970 年 10 月 2 日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享年 78 岁。韩槐准先生曾在新加坡生活 47 年，对种植业、药剂业及历史研究，都有一定贡献。其最大成就是在考古领域，他也擅长摄影，是一位又“博”又“专”的奇才。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韩槐准先生的陶瓷研究享誉国际。他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其坐落在新加坡的寓所取名“愚趣园”，成为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及艺苑名士经常聚会之处，这些名人包括郁达夫、徐悲鸿、刘海粟及许云樵等。1962 年，70 岁高龄的韩先生携夫人及子女返回祖国。他将在南洋所收集的中国外销陶瓷，全部带回祖国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曾受聘出任故宫博物院顾问，重点负责明清陶瓷研究。

郭葆昌先生（1867 ~ 1940 年）曾任故宫博物院陶瓷、书画审查委员会委员，是著名的瓷器专家，于抗战期间去世，他收藏的瓷器、书画精良。抗战胜利后，他的家属遵照郭先生的遗嘱，在 1946 年 2 月将其藏瓷 427 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如今，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中国陶瓷可谓自成一体，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到现代陶艺家作品，无所不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 8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人们不断地去整理研究、发扬光大。

注释

[1] 刘永池：《湘阴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 年 5 月 9 日。

[2] 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出版，1959 年。

[3] 宋·周辉撰：《清波杂志》，辑入《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 年。

[4] 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话》，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1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3 年。

[5] 宋·蔡絛撰：《铁围山丛谈》卷四，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 8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3 年。

[6] 《宣德鼎彝谱》，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40 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 年。

[7] 明·李东阳等敕撰、申时行等丰敕重修：《大明会典》（卷一九四），1989 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

[8]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二，志第五八，食货六），中华书局出版，1974 年。

[9] 明嘉靖·王宗沐撰修：《江西省大志·陶书》，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

[10] 明万历·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纂：《江西省大志·陶书》，国家图书馆藏。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9 册，第 207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2] 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张发颖、刁云展整理：《唐英集》，辽沈书社，1991 年。

[13][14] 铁源、李国荣主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七），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 年。



故宫博物院藏
古陶瓷精品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8000 ~ 前2000年)

陶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定居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发现所获得的资料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陶器生产距今已有 10000 多年的历史，陶器是原始先民主要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陶遗址的分布相当广泛，南北各地均有大量实物资料出土。主要分布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草原地区等，而且均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精美的彩陶而闻名，下游地区以工艺精湛的白陶、红陶和黑陶著称。东南沿海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代表。北方草原地区的陶器则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称奇。各地区的陶器虽都有其独特之处，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联系和影响。

1. 红陶孟及支座

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约公元前 6000 ~ 前 5600 年）/ 通高 20 厘米

孟 / 高 9.5 厘米 口径 10.5 厘米 底径 11.3 厘米

支座 / 高 10.5 厘米 足径 8.2 厘米

孟呈筒形。平底，底径略大于口径，外壁近口沿处口两侧有对称乳钉状凸起。夹砂红陶，表面粗糙。孟下支座由三个独立的靴形支架组成，支架下半部中空。这种由孟和支架组合而成的器具，堪称磁山文化最具特色的陶器之一。

磁山文化因最初于 1972 年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1988 年撤县设市）磁山村而得名。占地约 14 万平方米。1976 年至 1978 年曾进行大面积科学发掘，发掘面积 6000 平方米，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动物骨骼、植物标本等遗物。据科学测试，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6000 ~ 前 5600 年，属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年代向更远推了一千多年，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很高价值。

磁山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因烧成气氛不稳定，故呈色多不均匀，一件器物上有时会呈现红、褐、灰等色。加之陶泥未经细致淘洗，致使胎质粗糙。陶器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成型，胎壁薄厚不均。烧成温度较低，约为 700 ~ 900℃。陶器易碎。常见器物造型有环底三足钵、小口瓶、深腹孟及支座、碗、盘、豆、孟、瓮、鼎等。器物以素面为主，少数装饰有绳纹、篦划纹、指甲纹等。



2. 彩陶几何纹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
4800 ~ 前 3900 年）/ 高 16.4 厘米 口径 37.4
厘米

盆折沿，深腹，圜底。泥质红陶。口沿及外腹部均以黑彩描绘纹饰，口沿上描绘以点定位的水波纹，腹部描绘两层三角形几何纹，两层纹饰中三角形的大小及形状相同，但方向相反。经综合排比分析半坡类型彩陶上的纹饰后可以发现，这种三角形几何纹饰是由具象的鱼纹逐渐抽象演变而来。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 1921 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范围很广。其中心地区有北首岭、半坡（1954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首次发掘）、庙底沟（1957 年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村首次发掘）、西王村四个类型。半坡类型彩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圜底钵、卷唇折腹圜底盆、小口细颈大腹壶、尖底瓶等。纹饰多用黑彩描绘。其显著特点是纹饰中动物形象较多，但几何图案仍是主体，主要有带纹、竖线、斜线、波折线、三角纹等。

从该彩陶盆的造型、纹饰特征看，其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3. 彩陶波浪纹钵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 3100 ~ 前 2700 年）/ 高 9.6 厘米 口径 21.3 厘米

钵敛口，口沿外折，腹微鼓，腹以下渐敛，平底。橙黄色泥质陶，表面打磨光滑。钵内、外及口沿均以黑彩描绘纹饰。钵内以底心为中心描绘旋涡纹，外壁绘波浪纹，口沿绘三组菱形网格纹。此钵造型饱满，图案线条流畅，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的典型器。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因最初于 1924 年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黄河上游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过去亦有人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彩陶特别发达，而且可以依时代早晚分为马家窑、半山、

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马家窑类型彩陶造型有壶、罐、瓶、钵、盆等，多为橙黄色细泥质陶，器表打磨光滑，多以黑彩描绘条带纹、圆点纹、波浪纹、旋涡纹、方格纹、人面纹、蛙纹、舞蹈纹等。构图严谨，画法娴熟。图案设计采用以点定位的方法，使画面充分展开，尽情变化，具有强烈的韵律感。马家窑文化彩陶造型之丰富、图案之擅变，堪称世界陶器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迹。

时至今日，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古老的母题仍不失其迷人的魅力，那流畅的线条所产生的质朴的韵律感，像奔涌不息的黄河水，给人们的视觉带来美的享受。



4. 彩陶旋涡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约公元前2600～前2300年）/ 高37厘米 口径10厘米 底径13厘米

壶小口，短颈，圆腹，腹两侧对称置半环形系，平底。胎呈橙黄色。肩及上腹部以宽肥的带锯齿边的黑彩条带与细窄的红彩条带构成旋涡纹，利用线条的起伏旋转表现河水奔腾向前的韵律感。

这种将柔和的弧线和醒目的圆点相结合构成严谨的二方连续装饰带，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的典型构图方式，而图案边缘大量采用锯齿状装饰则是半山类型彩陶的显著特点。



5. 彩陶抽象蛙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约公元前
2200 ~ 前 2000 年）/ 高 40 厘米 口径 13 厘
米 底径 11 厘米

壶撇口，口沿较薄，短颈，溜肩，鼓腹，
腹以下渐敛，平底。腹部两侧对称置环形系。
泥质红陶。外壁于橙红色陶衣上以黑彩描绘
抽象蛙纹，图案线条流畅。抽象蛙纹是马家
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上的典型纹饰。

